

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四种模式与三个阶段

赵毅衡

内容提要 当代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符号泛滥,整个社会生活高度符号化,“符号消费者”成为人的主要社会角色。因此,中国学界乃至世界学界,不得不加强符号学研究,提高符号学在整个批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幸运的是,现代符号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相当精密的学科。符号学有过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历经过四种重要模式,索绪尔、皮尔斯、卡西尔、巴赫金都提出了有重大意义的系统符号学理论,但是他们的模式都暴露出片面性。因此,当今符号学一面要解决许多至今尚未有结论的问题,一面在寻找更加适用的模式,那很可能是批评理论四大学科间的融合以及符号学理论与门类符号学结合。

关键词 符号学 符号化 当代文化 批评理论

高度符号化时代到来

最近二十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一场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生产与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生产也不得不过物质生产。在当代,个人不是作为生产者实现人生价值,而是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作为一个符号消费者存在。社会必须照应生产者,失业率是全世界任何政府都在头痛的问题;消费者却照应政府,符号消费者更是为当代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这样的消息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而我们对这局面及其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分的理解;我们对当代社会符号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的研究和争辩。

从另一个方向看:在社会各阶层的对抗中,在国际范围的文化冲突中,对“符号权”的争夺,越来越超过其他实力宰制权的争夺。可以说,不仅是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无论我们是关心人类的过去、现状、未来,还是只想弄懂我们在各自

的生活中的幸福、苦恼、愤怒,不理解符号,就无法弄清问题的实质,更谈不上采取对策。

为什么符号学值得中国学界认真研究?值得在每个大学开设课程?值得让每个思索者动一番脑子?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这门学科产生一百年后终于成熟:现代符号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派的竞争更替,经过各国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一门比较完整系统的学科。它提供了一个极为犀利的工具,能相当有效地对付当代文化纷乱杂陈的课题。

第三个理由,符号学理论并不封闭,这个学科尚大有可为:它至今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符号学“原理”,不是公式,而是有发展可能;符号学“现有看法”不断受到挑战,无法定于一尊。在应用过程中,符号学不断有新的问题暴露出来,新的疆界不断被拓展。

为什么符号学能用来分析人类或个人面临的难题?因为符号是人作为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符号学就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的思索之综合提升。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与解释意义)的独一无二

二的方式: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既没有不用符号的意义,也没有缺乏意义的符号。

笔者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①“文明”往往包括其物质生产,而“文化”则全部由意义活动组成。钱锺书的分辨断然而清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②正因为文化是意义活动集合,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称之为“文科的数学”,是有道理的。

符号学在当代批评理论中的地位

对当代文化、社会及其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论辩,现在已经有个伞形称呼: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这个西文词原先指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译为“批判理论”;现在此词开始一般化,把文学、艺术、文化、文化政治、社会批判、全球化问题等都结合进来,中文可以译为“批评理论”。

批评理论从20世纪初发展到现在,已经极为丰富,以致20世纪被称为“批评世纪”。不管发展到何种形态,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这四个支柱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形式论。在20世纪初,这四种理论不约而同出现,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但是它们共同的取向是试图透过现象看底蕴,看本质,看深层的规律。批评理论各学派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的欧洲,这并不奇怪:欧洲思想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的压力。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出现这种历史对思想的压力。

20世纪批评理论的最重要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契(Georg 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马克思主义使当代批评理论保持批判锋芒。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很多是马克思主义者;而20世纪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主要从文化批判角度进入政治经济批判。

当代批评理论的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phenomenology/existentialism/hermeneutics)。这个体系,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哲学之延续。从胡塞尔(Edmond Husserl)开始的现象学与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开始的现代解释学,本来是两支,却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人手中结合了起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80年代的著名“德法论争”中,显示了较严谨的哲学思辨与解放理论姿态之间的差别。

当代批评理论的另一个支柱思想,是精神分析(psychanalysis)。这一支的发展,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libido)出发点,与中国人传统观念过于对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巨大,其陈意多变,表达方式复杂,在中国的影响也一直不够充分。

当代文论的形式论(formalism)体系,是批评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潮流似乎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产物,至今已深深楔入当代批评理论。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60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如今已与形式论几乎同义(叙述学、认知语文学等,是符号学普遍原则在特殊领域中的扩展)。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一方面形式论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形式,批判锋芒越来越锐利,被称为整个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代,流派结合成为开拓理论新阵地的主要方式:对当代批评理论做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这四个体系中几种的结合,此时符号学作为人文社科的总方法论,作用就相当清楚。70年代前,两个体系结合已经常见,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拉康的心理分析应用了大量符号学概念。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结合体系方式推进到新的领域:克里斯娃用符号学研究精神分析,展开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博德利亚则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尖锐的剖析;利科等人的工作重点是把解释学与形式论结合起来,符号学与解释学,成为一个学说的两种称呼。福柯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把鉴别符号,确定为什么符号成为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③的确,一旦理论涉及意义问题,就必然用符号学作为基本的方法论。

近四十年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往往都以“后”的形态出现。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原来都是结构主义者,这证明结构主义有自行突破的潜质;后现代主义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后殖民主义研究则反映当代世界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新形式;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看作“后男性宰制”的学说,可以说,60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都是上述四个支柱理论的延伸产物。

把现代批评理论分成“四个支柱,若干延伸”,自然是过于整齐的切割。本文只是想指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

覆盖了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触及的所有课题。只要我们能时时回顾四个基础理论,我们就完全不必跟着西方“最时髦理论”奔跑,我们就能走出“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自语”的两难之境。

“关门自言自语”并不是出路。认为靠整理 19 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语汇,学界的民族自豪感能得到满足,就能解决当前文化面临的种种难题,任务就太简单了。既然 19 世纪之前西方也没有批评理论,那么 19 世纪前的古典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批评理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整个批评理论是现代性压力的产物,今天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兴起,正是这种压力的体现。只要我们掌握了四个支柱理论,我们就能与各国学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世界批评理论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符号学的四种模式

符号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几种模式,今日符号学不可能完全抹除这几种模式留下的印痕。尤其是,符号学的各种“历史原典文献”,更在一定模式的产物,既有开拓之功,又带上模式本有的局限性,不可不察。

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体系之一,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20 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因此,当结构主义符号学在 60 年代潮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30 年代的布拉格学派、60 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构筑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例如巴尔特研究时装,集中于时装的语言描述;格雷马斯对符号方阵的理解,实际上是概念语项的对峙。但是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共时封闭格局。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④(only minor),“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迅速发展边缘化了。

符号学的另一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符号的解释成为进一步表意的起点,向无限衍义开放。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 70 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

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

皮尔斯模式的缺点是他本人兴趣过于广泛,对符号学讨论过于零散,真知灼见散落在各种笔记信件之中,而且皮尔斯热衷于分类,对复杂的符号现象作整齐分类,难免有失诸勉强之处。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文化符号论”^⑤。他的符号学从哲学出发,建立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Susan Langer)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Kenneth Burke)的“符号行动”理论。^⑥伯克接近新批评,50 年代初曾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⑦这个学派对于方法论和可操作性缺少关注,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但他们对文化运行规律的重视,今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符号学的第四种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他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很多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Language-Centred Marxism),但他的成就长期默默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提出许多精辟之论。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较浓。如何处置技术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当今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

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 20 世纪初至今,符号学的四种模式都有过展开机会,符号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出现于 20 世纪上半期,主要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释。除了上述四个模式的奠基者,还出现一批最早的推进者:莫里斯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巴赫金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早期推进远远突前的是索绪尔理论。由于得到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伊等)、符号语言学派(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的热情推进,索绪尔符号学在 60 年

代前率先成熟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二阶段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个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60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克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布勒蒙、托多洛夫、索勒斯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60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荅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人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总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的几种模式,尚未能汇合: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第三阶段出现于70年代中期,到今天仍然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皮尔斯的开放模式取代了索绪尔模式,由此结构主义自我突破成为后结构主义。除了皮尔斯模式,巴赫金与塔尔图模式也开始扩大影响,卡西尔与伯克的贡献也被后人重新发现,一些被忘却的奠基者,如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 Welby)的贡献,也被大规模整理出来。^⑧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种模式成为一个新的运动。多元发展方式显然是正确的,拘守模式对符号学不利:当代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会使任何模式迅速陈旧。模式意识淡漠,可能会使这个学科缺乏权威或明星,没有权威却能使这个学科四面出击,向任何需要符号学一显身手的方向推进。因此,第三阶段符号学的特点,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各种门类。

符号学与其他学派的结合

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认为(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源头:语言学(包括语言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解释学。^⑨这个说法其实是追溯西方学术传统,即使在西方传统中,对符号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还有很多:诗学、艺术学、美学、传播学、认知理论、心理学(尤其是格式塔心理学)、人工智能甚至生理学(例如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例如遗传学与近年的基因理论)都为20世纪符号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⑩符号学本来就是许多学科汇合的产物,当代符号学的发展,更是向学派融合的方向推进。

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文化的意义行为,看成话语权力网的运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上至为契合。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沃尔佩

(Galvano Della Volpe)的符号美学、詹姆逊(Fredrick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符号文化社会学、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解码理论、伯明翰学派如费斯克(John Fiske)等人的亚文化“符号抵抗”研究、博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资本理论、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商品符号学、霍基(David Hodge)等人的符号社会学,更早的时候,还有东德克劳斯(Georg Klaus)等人的“唯物主义符号学”。这种结合俨然汇成大潮“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或称社会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派。这个学派的论辩展开的基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其方法是符号学式的分析,其批评对象也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转入符号霸权。这个角度击中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经济的命脉,当代符号学的最重要分支就是符号学社会批判。

符号学与心理分析,也是互相吸引,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的“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从“能指链”入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他的精神分析符号理论奥秘难测;在克里斯荅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结合的桥梁;当代性别研究,例如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论,大量吸收符号学的成果,在“身体政治”、“性别政治”、“娱乐文化中的女性”等关键课题上,符号学为当今性别研究送上了犀利的解剖刀,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在近年开始形成。^⑪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与符号学有相当多重叠部分。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仔细讨论了符号问题(后来德里达就是在符号问题上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无独有偶,符号学奠基者皮尔斯,也提出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理论。30年代舒茨(Alfred Schuetz)已经开始现象学式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梅洛—庞蒂则是将符号学与存在主义结合的第一人;此后格雷马斯、库尔特、高盖等人发展“主体符号学”理论;塔拉斯蒂近年的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存在主义符号学^⑫,卡勒与艾科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了全新的阐发,而希尼(Carlo Sini)等人发展出较系统的现象符号学,利科(Paul Ricoeur)深入总结现象学与叙述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

第三阶段符号学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都是与其他学派融合的产物。符号学与这几个文化批评支柱理论的结合,已经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必须依靠学派融合,扩大符号学的视野。

应用符号学

第三阶段符号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在文

化的所有领域中应用符号学——“门类符号学”,实际上是近年符号学最突出的表现:所有与意义研究相关的课题,都转向符号学,以获得更深一步探索的进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本身的主要推进方向,是诸多“门类符号学”,各种门类的的应用更形成大潮。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都涉及意义活动,因此都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至今可以说,没有一个文化部门没有受惠于符号学,在西文与东方文字中,广告、商品、商标、时尚、明星、旅游、游戏、体育、竞赛、教育、赛博空间等领域,都出现了符号学论著;在社会符号学方面,城市、考古、宗教、亚文化、民俗、庆典、生态等领域,也都有符号学的专门研究;在艺术符号学方面,电影、音乐、图像、建筑、设计等领域,符号学都找到用武之地。以上单子还不包括超出一般社科与人文领域的“准科学”,如法律、刑侦、人工智能甚至风水等。

几乎所有这些门类符号学研究,都是近20年来的成果,其范围之广,雄辩地证明符号学可以成为社会与人文研究的总方法论。某些杰出的“门类研究”(例如伯明翰学派的大众传媒研究,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纳梯艾兹的音乐符号学^⑬),证明门类应用也能对符号学理论做出相当贡献。当然,符号学理论永远无法代替门类研究(因为学科门类需要专门知识),但是既然这些专著命名为某种符号学研究,符号学理论不断地受到挑战,适用性本身是对理论的考验。

在目前这个第三阶段,符号学版图地域在扩大:符号学近年在日本、中国、印度以及拉美各国发展势头迅猛,符号学进入全世界的大学,成为大学文科教学一门不可或缺的课程。符号学与非欧美民族哲学传统的结合,已经产生相当的成绩。中国学者在整理中国哲学中的符号学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如果东方的学术传统至今尚未能充分融入符号学,只能说明符号学的发展还有很大余地。目前,符号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项,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国的先秦名学、禅宗美学、唯识宗和因明学的成果。东方资源的进入,将把符号学理论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地。

应当坦诚地说明:单靠东方现代之前思想史的理论成果,不太可能为符号学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体系,正如西方19世纪之前关于符号的讨论(例如欧洲中世纪修辞学)一样,只能有借鉴意义,任何人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民族古代讨论意义文本的文献,构筑一个足够当代应用的全面的符号学理论。此种努力,只是一种“虚构的谱系学”,或“黄金时代传说”(Golden Legend)^⑭。换句话说,构筑一个“东方符号学”,与构筑一个独立“西方古典符号学”一样,都是有用的,但不可能代替现代符号学体系。

现代符号学,只有在现代性充分成熟后,在对意义问题的深层底蕴的寻求成为气候时,才可能产生。当代符号学是在20世纪初多个形式论源头(索绪尔、皮尔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等)上同时萌发的,这种条件在20世纪之前,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不存在。这不是对西方或东方的偏见,任何学科不可能完全靠回到过去向未来推进。

符号学的工作范围

以上讨论,使我们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论:人类淹没在符号中,我们接触到的世界由符号组成,至少我们能够认识的世界也只是符号。这种看法称为“符号普遍论”(pansemiotism)。

“符号普遍论”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是认为“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区分,在于“人的世界”由符号组成。索绪尔认为整个非符号世界,“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晰的……只是混沌不分的星云”^⑮。并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⑯,并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

另一种则进一步认为人之外的世界也由符号组成。皮尔斯认为“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⑰皮尔斯这段文字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例如霍夫迈尔,把从大爆炸开始的整个宇宙史,描写成充满符号意义的历史。^⑱他指的是大爆炸的遗迹(例如“红移”,例如“辐射背景”),成为宇宙历史的符号。

符号只是当人在世界中寻求意义时才出现,而真实世界(不管是“物理世界”或“经验世界”)成为人化的世界后,才具有存在的本体性质。应当说,超出人的经验范围之外,这个世界哪怕如皮尔斯所说充满了符号,哪怕宇宙的历史如霍夫迈尔所说全是符号的历史,它们绝大部分也只是潜在符号。上述第二种看法,未免太夸大。

由此出现“泛符号学论”(pan-semiotics)。洛克是第一个使用“符号学”这个词的人,他认为全部人类知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物理学”(Physicā)、“技能学”(Practicā)、“符号学”(他拼写为Semiotikē)。“符号学”涵盖了全部今天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⑲无独有偶,利奥塔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把人类知识分成“科学知识”与“叙述知识”两个部分。洛克里奥塔的说法不能说错,甚至可以说不够。

说普天下学问都是符号学的范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都卷入意义。王夫之的界定更宽“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⑳中国古人已经看到《易经》

符号学“统会天下之理”。

对这个局面,艾柯有一段理解,应当说非常合理。“一种看法是一切必须从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另一种看法是一切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①第一种看法是“符号学帝国主义”,第二种看法切合实际,而且是否有用的确要具体看:运用符号学知识,不一定能有效地推进这些学科。专业特征过强后,符号学规律就只有一般的参照意义。

李幼蒸对符号学的研究领域边界提出一个看法“符号学只研究那些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一旦某种意指关系问题充分明确之后,该研究即进入了科学学科阶段。”^②这个观察原则上非常正确,但是实际工作时却不得不受限制。科学学科,无论意指关系是否已经明确,都不是符号学能扮演积极角色的领域,科学技术的符号意指关系,即使暂时编码还不够强(例如气功治疗、基因研究、破解密码、地震预测),也不会请符号学家提供指导意见。符号学要处理的对象,是从本质上“意义歧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它不可能处理“期盼为强编码”的任何学科。

由于这种边际流动状态,符号学理论面对的问题在增多,有些老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当代文化的发展,在不断挑战符号学,迫使符号学理论不断发展,边缘模糊不清成了符号学的常态。

当今时代面临一个大变局,文化变型加速,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满溢”,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建立一个能对付当今文化巨大变化的符号学理论,社会要求已经很迫切。

21世纪的世界急盼人类对它取得一个符号学的理解,因为21世纪的世界,不仅是符号泛滥,而且已经整个浸泡在符号之中,不可能脱离符号过饱和状态。人类文化很可能快步走向一场难以阻挡的符号危机:人们至今还没有仔细查看符号,至今没有认识我们放出魔瓶的这个怪物,怎么谈得上制服它?

说“21世纪是符号世纪”,不是符号学者的自夸,相反,是对人类社会前景的一种深深的忧虑。

olis: Indiana Univ. Press, 1990, p. 64.

- ⑤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在卡西尔1945年去世时其第四卷只留下零星手书草稿,近年整理出版: *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98. 注意 symbol 一词,与 sign 意义相当部分重叠。西语用法十分混乱,本书为求统一在应当译成“符号”的地方,就不拘泥于原文。
- ⑥ Kenneth Burke,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⑦ 参见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139页。
- ⑧ Susan Petrilli (ed),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New York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 ⑨ 茨维坦·托多洛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页。
- ⑩ Winfried Noth (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90, p. 11.
- ⑪ Darlene M. Juschka, *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London: Equinox, 2010.
- ⑫ Eero Tarasti, *Existenti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Univ. of Indiana Press, 2000.
- ⑬ Jean - Jacques Nattiez, “The Contribution of Musical Semiotics to the Semiotic Discussion in General”, in Thomas A Sebeok (ed), *A Profusion of Sig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7, pp. 121 ~ 142.
- ⑭ Paul Bouissac, “TheG ‘olden Legend’ of Semiotics”, *Semiotica*, 17, pp. 371 ~ 384.
- ⑮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69, pp. 111 ~ 112.
- ⑯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 ⑰ *The Essential Peirce*, Bloomington: Univ. of Indiana Press, 1992 ~ 1998, vol. 2, p. 394.
- ⑱ Jesper Hoffmeyer,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Bloomington: Univ. of Indiana Press, 1996.
- ⑲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Chapter XXI, *The Division of the Science*, London: BiblioBazaar, 2006, p. 189.
- ⑳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39页。
- ㉑㉒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6 p. 27 p. 64.

作者简介:赵毅衡,1943年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刘蔚)

- ①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9页。
- ② 钱锺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33页。
-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3.
- ④ Winfried No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 Indianap-